

内 容 提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调乡村武装斗争工作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城市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武装斗争依然是主要形式，但城市工作对其强有力的辅助，同样功不可没。首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从理论上确立了城市工作在抗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中国共产党凭借城市有别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最广泛地动员了全国的抗日民众，把城市与各抗日根据地有机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抗战前线的坚强后盾，且直接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中心，有力地配合了反侵略战争的全局。

由此可见，城市工作与军队、根据地工作构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党的城市工作，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就可能在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中趋于孤立，更会在国民党背信弃义时失去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城市工作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有力辅助，是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中国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革命根据地与广大城市的密切配合和互为补充，牢牢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特点，制定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唯一通途。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强调乡村工作的同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城市工作。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众多同志曾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无数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战斗在城市这块中国革命的特殊战场上。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城市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文章见之不多，城市工作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与论述。今天，在对城市工作作了广泛的资料征集与研究工作后，我们有责任对城市工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一次系统的认识与探讨，以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就城市工作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时期，同中国革命的其它几个阶段一样，中国人民抗日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抗战的胜利，主要依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抗日军队及其广阔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城市工作与抗战的脱离，在抗战八年中，广大的城市人民，始终依据城市有别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为抗战作着贡献。军队工作、根据地工作、城市工作构成了中国抗战的一盘棋，其中城市工作以乡村工作不可取代的特殊性，有力地辅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如果脱离了城市工作的这种有力辅助，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就有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封锁中趋于孤立，在国民党背信弃义时失去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们说，中国抗战，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城市工作是有力的辅助，是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其领导格局， 决定城市工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抗战，从一开始就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较量，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虽然改变了其不抵抗政策，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①但在实际贯彻中，却压制爱国军队的抗日积极性，压制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一味强调单纯的政府抗战，实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抗战路线。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目标，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②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中国城市民众同样必须承担起抵抗侵略的伟大使命。

在这种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1940年9月18日发出《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指出“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以后，又要求“在党内各种刊物及各种党的会议上发表文章与报告，加紧对同志的教育与解释到敌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使同志在政治上有足够的认识，精神上有彻底的转变，提高干部对这一工作的兴趣与热情。”^④1944年6月，在中国抗战局势由相持阶段

向战略反攻方向转变的时候，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的进攻日寇……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⑤从而最终确立了城市在中国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

围绕城市工作是中国抗战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一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长江局，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大后方、南方各省及平、津、唐沦陷大城市的工作，并从延安抽调了一批有城市工作、秘密工作经验的高级干部到各大城市开展工作，恢复与重建省市一级的秘密领导机构。与此同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向尚未沦陷的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桂林、南宁、西安、长沙、南昌、兰州、乌鲁木齐等12个大中城市派驻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共代表。以秘密、公开两条并列的战线，加强对城市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40年9月，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中共中央特别设立“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同时决定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区的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正确指导与领导机构的及时配备，为城市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并在抗战中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奠定了组织基础与策略保证。广大的城市民众，在城市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城市之所长，对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二、党卓有成效的城市工作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它在政治、文化、经济、金融、交通诸方面均具有乡村无可比拟的领先优势，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经济命脉之所在，文化荟萃之基地，拥有庞大的舆论机构和雄厚的物质人力资源。党积极利用城市所固有的特点和职能，在文化、统战、国际声援、物质支援乃至城市自身的群众斗争和城市边缘的武装斗争等方面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城市工作在抗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城市的革命文化活动是党领导下的又一方面军

城市在精神生活和技术设备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众多生活其中的各界文化人士，构成了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围。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如何正确引导群众的抗日情绪，把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有效地发挥出来，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于是，以文化为媒介，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推上了城市工作的重要位置。

抗战伊始，在党的领导和协调之下，上海、武汉、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革命文化活动通过新闻出版、戏剧歌咏、漫画木刻等各种形式蓬勃开展起来。作为抗战初期政治中心的武汉，仅公开出版的报刊就达百余种之多，其中包括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如果再加上上海、广州、成都、香港等地出版的报刊，就更加不计其数。

这众多的进步报刊，形成一个广阔的幅射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谋求国共合作的真诚态度；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战斗的光辉业绩，介绍两军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良好军纪军风。

特别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袖人物的专题采访，有力地击破了社会上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所作反共宣传而留下的阴影，使广大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遍及各大城市的戏剧演出，从剧目来看，既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法西斯细菌》、《放下你的鞭子》、《抓壮丁》等反映抗日精神的时代剧目，也有借古讽今，以史喻时的历史剧《明末遗恨》、《海国英雄》、《正气歌》、《梁红玉》、《李秀成殉国》等等。演出紧扣时代的脉搏，给观众极强的震撼与感染，受到群众普遍欢迎。有的剧目连演几十场，仍然欲罢不能，不少还成为可供长期演出的保留剧目，堪称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戏剧曾作为进步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重庆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其中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公演，可谓登峰之举。剧中《雷电颂》的长篇独白，慷慨悲壮，气势恢宏，融政治效果于艺术感染于一体，抒发了人民对光明的热切渴望和对反动统治的极度憎恨，坚定了人们战胜黑暗去迎接曙光的信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面目日益暴露。于是，揭露国民党阴谋，扩大共产党政治影响，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鼓舞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成为当务之急。1940年9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开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⑦

相持阶段的敌后城市革命文化运动是以重庆、桂林为中心展开的。由武汉迁往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依然不变其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主张的初衷。秘密出版《解放日报选刊》，专门发表中共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以及《解放日报》（延安）社论。周恩来曾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和专文，精辟分析国内外形势，驳斥国民党的谬论，指明团结抗日的有利因素和前途，并重申中国共产党不逐日寇誓不罢休的决心。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以大义凛然之气，冲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向全社会公开了事变真相，并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著名题词，引起国内外震惊。毛泽东赞扬《新华日报》是有别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又一方面军。^⑧

桂林，素有“文化城”之称。由于国民党桂系势力政治上相对开明，1939年以后，茅盾、田汉、胡愈之等大批文化名人相继撤到桂林。抗战初期创办于上海的《救亡日报》也由夏衍负责，从广州迁来桂林出版。在确定办报方针时，周恩来对夏衍说：“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要“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⑨《救亡日报》正是以其为宗旨，成为桂林进步文化的核心，团结了文化人士，吸引了广大读者。并销往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以及香港、南洋。《救亡日报》由上海而广州而桂林始终如一，深受群众欢迎，成为抗战进步文化的一个重要堡垒。

革命文化作为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工作，无论抗战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它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转辗中华大地各城市，此消彼长，久盛不衰，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生力军。它为抗击日寇而呐喊，为民族解放而鼓劲。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导向作用。感召大批有志之士投身抗日洪流，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抗日力量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保证

（二）城市的上层统战工作作为党的各项抗日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保证。

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视为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列的三大法宝之一。而抗日战争时

期，动员全民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视社会职业之别，不论社会地位之异，共同投身保家卫国的战斗，使中国抗战立于不败之地，统战工作就更显得至关重要；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和民族共识，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宽绰的前提。

城市的统战工作是以上层统战为其特色的。城市作为国家繁华兴荣的象征，各行各业的精英荟萃于此，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所产生的效应及其作用，是其它任何途径都难以实现的。

抗战时期，党在各城市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抗日为宗旨，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各城市的统战工作，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之下，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上海地下党在日伪包围中的孤岛所开展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是最有特色和成效的。

上海统战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上层统战工作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紧密联系起来。以各界救亡协会诚邀各界热心抗日的中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行列中来。文化界、职业界推出蔡元培、茅盾、沙千里等众多知名人士担任协会理事等职。散布于各行各业的抗日团体，则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为宗旨，以俱乐部的形式，努力争取本系统中上层人士出面支持。这样，不但在党的周围团结了相当一批政治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而且由于他们的出面，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教育，为新四军捐钱募款活动，赢得了合法的地位，也吸引更多的基层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

上海统战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对积极投身抗战的进步人士，上海地下党以聚餐会的形式，经常与他们碰头，研究工作，传达党的指示，通过他们的社会声誉推动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

被中共中央称之为“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⑩的难民参加新四军工作，与宗教界人士赵朴初的积极奔走和努力推动是分不开的。要从日伪包围下的孤岛送出大批青年去参加新四军，没有公开合法的口号显然是不可能的。上海地下党在与赵朴初多次商量之后，打出了“移民垦荒”的旗号，并通过赵朴初向“慈联会”负责日常事务的黄涵之说明送难民回内地开荒种地的道理。最后，以“慈联会”的名义，租船将难民送出上海。

统战工作不仅为抗日活动的合法提供了保证，也在物质经济上帮助了党的抗日事业。中共江苏省委“文委”领导的《每日译报》创办之初，敦聘文化、教育、出版、职业、金融、妇女、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通过他们所在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关系，给予报社直接或间接的支援与帮助。同样，《西行漫记》能在1938年如此快地与读者见面，也得益于地下党通过星二聚餐会这一渠道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售预付书券，筹备资金。

在武汉，重庆等国统区城市，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倾向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配合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迫使他们坐下来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保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不至破裂。在纷繁复杂的统战工作中，文化统战是重要的一拓。中国共产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三大组织，把国统区中持不同政见，不同文艺观，不同文艺派别的文艺工作者，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文艺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他们曾通过纪念屈原、鲁迅，为郭沫若、老舍、茅盾等一批进步作家祝寿，庆祝他们的创作生活等社会活动，借以

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气节，光大鲁迅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以郭沫若、老舍、茅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鼓舞人们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期，保持清醒头脑，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分清敌友，加强团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香港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成为联系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桥梁，最大的成功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出色的统战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一直与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陈嘉庚因宣传抗日真情遭到国民党围困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动侨胞，在舆论宣传上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他以极大鼓舞。皖南事变后，陈嘉庚在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困难的紧急关头，在香港开办有利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解决了《华商报》出版中的重大困难，并使其一直坚持出版到香港沦陷。

综上所述，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战时期，贯穿于城市工作的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依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的有效武器和重要纽带。

（三）城市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桥梁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开始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海外华侨、港澳、东南亚一带的侨胞及众多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社会主义苏联，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予以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这种来自国际的关注。大城市在政治地理上的特殊条件，使之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桥梁。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的主要窗口是位于中国南方的香港，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和西北的兰州。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以其毗邻海外的地理优势，几乎成了世界支援中国抗战物资汇集的总站。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援华物资大都集中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呼吁支援中国抗战，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并根据当时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况，把建立和完善八路军及延安的医疗保健事业列为争取国际援助的重点。在1938年召开的国际和平同盟世界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在晋察冀边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决议。由加美医疗队负责人白求恩任院长，由英国援华会捐助2450英镑作为开办费。以后通过香港这一国际援助渠道，为国际和平医院搞到了第一架便携式X光机，第一架医用显微镜，第一批新型外科器材、麻醉剂、磺胺药和第一架制造外用青霉素的简单器械。据不完全统计，由香港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援华物资共约120多吨，平均每月达3吨左右。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医疗服务的外籍医务人员不下百人。

在重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利用武汉、广州沦陷后，重庆成为战时政治中心的地位，广交国际朋友，建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等一系列旨在反对法西斯独裁的国际性团体，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外交上，热情接待来华考察抗战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会长陈嘉庚，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其中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在考察结束后，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予以了更加广泛的物力、财力支援；而斯特朗在皖南事变后于美国发表的周恩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长期媚外反共，酝酿内战的材料，在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是极大的支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要求与英美国等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的工作在广泛的领域内进一步活跃起来。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先后在重庆接待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妇，印度援华医疗队，国际红十字会管理人员，罗马尼亚援华医疗队成员，并安排组织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宋庆龄“保盟”在重庆的重建工作。在渝四年中，“保盟”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争取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其中指定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就达651,500美元，170,701,000法币，并在交通运输受到国民党重重阻挠的极度困难中，把延安急需的医药物资送过去，缓解了延安药物短缺的困难局面。

社会主义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者。中国共产党通过苏联设在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一直保持着直接联系，并开辟了由延安到西安，经兰州、乌鲁木齐至苏联的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一方面承担了运送苏联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武器、弹药、医药用品的任务；另一方面是负责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去苏联治病、学习及回国的行程。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肖三、刘亚楼、李天佐、孔原等赴苏及回国的行程，主要是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受理的。

国际援华物资虽然在中国抗战所需物资中的比例是有限的。但从这些物资中，反映出一种精神力量，即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已经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要求进步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关注。正如宋庆龄所说的：国际援助“象征着外国对中国团结抗日的兴趣，间接地削弱了破坏团结的力量。”^⑩而城市在这中间起了极其重要的联络作用。

（四）城市中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斗争是抗日战场的延伸，动摇着日帝统治的中心府关

抗战爆发后，各城市的地下工作者领导职工、学生及各界市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声援抗战，支援前线工作。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北平，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29个抗日团体组成的抗敌后援会，组织北平的职工、学生、踊跃支援29路军抗战。在上海，由各行各业职工和学生组成的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纷纷活跃在八一三抗战前线。广州、武汉、香港等暂时远离抗日前线的城市，广大市民则通过发表通电的方式，声援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抗战，开展广泛的“七七”、“八一三”献金活动。即使在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后，处于日伪严密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广大地下城市工作者，仍以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与日伪展开直接的交锋，顽强坚守城市的抗日阵地。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斗争，相对其它沦陷城市而言是较为突出的。孤岛时期，针对日伪势力对孤岛的渗透，对主张抗日的宣传阵地和抗日人士进行的恐吓、破坏与暗杀，在国民政府在沪企事业单位中掀起的接收狂潮，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反对日伪禁悬中国国旗的悬旗斗争；反对日伪接收海关、邮局、学校的护关、护邮、护校斗争；反对日伪暗杀的出差汽车司机大罢工。这些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宏扬了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坚定了人民的抗战信心。与此同时，针对群众生活因物价上涨而日趋困难的情况，地下党一方面向群众宣讲日帝对上海经济封锁、奸商屯积居奇与物价上涨的直接关系，以增加人民的仇敌、憎敌情绪；另一方面，主动领导职工群众开展改善生活的斗争，既帮助群众改善生活，也粉碎了敌人企图以生活斗争控制上海工运的阴谋。改善生活斗争，壮

大了上海职工的抗日救亡队伍，特别是团结了更多中间落后群众投身到抗日中来。斗争中发展的基层党组织，填补了部分过去没有我党力量的空白点，从而为上海地下党在全面沦陷后的困难时期，坚持抗日阵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上海全面沦陷后，根据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三勤”方针，地下党以生活互助社等带有中间色彩的社团，通过办图书馆、理发室，组织小型比赛等活动，团结群众，坚守阵地。对日军企图以上海作为其军事基地的阴谋，上海工人阶级以怠工、静坐、破坏机器等多种形式，与其开展斗争。

由此可见，城市内部自身的抗日斗争，相对炮火连天的抗战前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它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势力对城市各领域的全面渗透，使民族利益少受侵犯。斗争中，广大群众经受了生死考验，实现了一次自我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民族意识。斗争实践也培养了一批群众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城市作的一支有生力量。

(五) 城市雄厚的财力、物力、人力，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城市尽管不是抗日的正面战场，但其雄厚的财力、物力、人力，为正面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人、物、款的直接支援，成为反侵略斗争的坚强后盾。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承认了八路军、新四军，但从来就没有公正地对待过这两支抗日军队。给予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以人、物、款的最大支援，是中共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关系到抗战成败的关键一环。在八年抗战中，各大城市支援给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的物资，小到一双鞋，一支笔，大到各类机器设备，凡根据地需要而又缺乏的，城市党均以最大的努力予以支援。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地下党通过各基层支部，在群众中开展秘密劝募活动，把劝募所得的毛衣、手套、袜子、自来水笔、笔记本、药品等物资送往根据地。同时，地下党还以党员和“民先”队员业余劳动所得，为八路军购买电讯器材、印刷机、电池等。而北平地下党为八路军提供的北平日伪军分布图和军事地图，为其了解敌情，知己知彼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物质支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是极其可观的。上海地下党利用孤岛特殊的环境，以“节约献金”、“节约救难”、“义卖”、“义演”等形式，为创建和发展时期的新四军，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必不可少，极其宝贵的钱款。总计整个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支援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钱款达130万元。上海支援新四军的各类物资，更是不胜枚举。在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向皖南集中之时，上海地下党以煤业救护队参加新四军的形式，为新四军提供了25辆汽车。这些汽车为南方八省游击队迅速向皖南集中作出了特殊贡献。在皖南新四军的后方医院中，从医疗器械、药品到病房中的蚊帐，都有上海人民支援的物资。苏北抗日根据地上的第一家书店——大众书店，是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书籍到苏北开办起来的。

在人力支援方面，城市除了为部队提供部分战斗员外，更主要的是提供具有一定革命工作经验和相当知识水准，拥有一技之长的革命干部、文化青年、教育工作者、各类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等等。首先，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城市尚未沦陷前，各城市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以各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号召城市青年赴延安、皖南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仅武汉一地，在1938年5月至8月4个月中，经武汉八办介绍到延安的青年达880人之众。以后，随着华北、华中各主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城市党改变形式，以隐蔽秘密的手段，继续坚持人力支援工作。在北平，地下党为使输送的人才适应战时需要，在部

分青年赴根据地前，专门安排他们学习爆破技术。在上海，地下党以半公开、秘密等各种形式，先后为新四军输送了约2万余人的各类人才。其中有根据新四军对文化青年的要求，以“上海民众慰劳团”的形式，为新四军送去的进步文化青年骨干，有通过神州职业夜中学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的收发报专门人才。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创办所需的教师和学生，大都是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从上海的大学及专科学校中组织动员去的。其中江淮大学校长一职由身兼上海之江、复旦、大夏三校教授的韦悫担任。

城市地下党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不间断的人、物、款支援，不但在其创建、发展、巩固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帮助其粉碎日伪扫荡与围剿，击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其名副其实的后盾。

（六）城市周围的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了反侵略战争的全局

城市和交通要道，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重点占领的地区与统治中心。党的城市地下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后，围绕“武装斗争”这一全党中心任务，先后组织与派遣了相当部分的党员干部与青年积极分子，到城市四郊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游击区。在华北、华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则由城市四周的游击战争发展形成了中国抗战的第三块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城市周围的游击战争，不但正面抗击着日帝的侵犯，牵制了部分日伪军，而且使其视为战略基地的后方不稳，有力地配合了反侵略战争的全局。

在北平，地下党本着北平沦陷后“党员在城内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到了城外就能起一百人的作用”^①的宗旨，确定了大量往城外输送党员干部的方针，决定“除留下做地下工作的少数干部外，凡是能参加游击战争的，都派到乡村中去，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游击战争。”^②为此，北平市委在及时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联系的同时，其主要负责人黄敬、李常青、刘慎之、刘杰等先后离开北平，去四郊组织群众，并安排市委所属的党员、积极分子及“民先”队员，分散到平郊各地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革命力量，在北平四周迅速发展起一支支游击武装，并配合八路军于1939年至1940年间，在平西、平北、平南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上海四郊游击战争的开展虽较北平为晚，但中共江苏省委在组织重建后不久，就确立了“党的工作不能束缚于租界之内，应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向上海近郊各县扩大，开展日寇直接统治区域的工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③的工作方针，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沪宁杭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外县工委迅速派出党员干部，秘密奔赴市郊和苏南农村开展工作。同时省委又通过所属的工委、职委、学委、妇委、难委及各外围团体，动员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到各地农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在浦东、浦西、苏常太、澄锡虞、崇明及通如启海地区建立起一批游击队，发展了一批游击区。1939年5月，新四军奉命东进，这些地区的游击队给予及时的接应，使新四军直插上海近郊至日军重点把守的虹桥机场，给驻守上海的日军以沉重一击。此后，上海近郊及苏南、苏北的游击队，配合新四军，在与上海毗邻的苏南、苏中、苏北、浙东迅速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位于中国南疆的广州，是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中的战略要点。中央广东省委在抗战爆发后，就十分重视抗日游击战争，省委一方面在广州各大中学校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培养抗日游击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广州的青年抗日团体，深入到广东省内各县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底先后在东江、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地区建立

起6、7支抗日武装，在华南战场与日寇展开长期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敌、伪、顽的夹攻中，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万余人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使其成为与华北、华中并列的敌后第三大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工作者突破重围在城市四周建立的抗日武装，在与日伪军的交锋中，牵制了部分日伪军力量。仅华南一地，游击队就抗击着这一地区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减轻了其它战场对日作战的负担。随着游击区的扩大，乃至在城市周围形成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使敌人在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小。在北平，敌人的统治仅局限在方圆六十里地的半径之内。在争取抗战胜利阶段，城市四周的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在交通要道对日军所发起的攻势，加速了日军的灭亡，为中国人民从大城市驱逐日帝出中国，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经验表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其中，城市工作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离开了城市对乡村根据地的配合，放弃城市自身内在的工作，所谓最后夺取城市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将归于失败。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没有城市工作和其它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④中国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根据地与广大城市的密切配合和互为补充，牢牢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城市工作以其特有的贡献与效用，应该在中国革命史上找到它相称的位置。

注：

- ① 引自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2卷。
- ②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
-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
- ④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存：《中央城委对敌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1年3月18日）。
- 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载《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
- 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载《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
- ⑦ 熊复：关于《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收入《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 ⑧ 夏衍：巨星永放光芒收入《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 ⑨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增刊（2）——《上海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
- ⑩ 宋庆龄：从香港到重庆收入《永远和党在一起》。
- ⑪ 李常青：《七七事变后北平市委的情况》，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8期。
- ⑫ 吉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区抗日斗争概述》，载《北京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 ⑬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
- ⑭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